

东游运动与潘佩珠日本认识的转变

刘先飞

(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州 510275)

[关键词] 潘佩珠; 东游运动; 对日认识

[摘要] 《潘佩珠自判》呈现出了东游运动前后潘佩珠对日认识的变化。赴日前, 潘佩珠认为日本是同文同种的新兴强国, 期望日本军事援助越南。东游运动失败后, 潘佩珠认为日本背弃了黄种人和亚洲, 是个重强权、轻道义的国家。他对日本国民素质则始终赞赏, 以之为越南人的学习对象。

[中图分类号] D833.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11)05-0069-05

The Changes in Phan Boi Chau's Understanding of Japan after the Movement of Traveling about Japan

Liu Xianf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Keywords: Phan Boi Chau; the Movement of Traveling about Japan; Understanding of Japan

Abstract "Biography of Phan Boi Chau" reveals the changes in Phan Boi Chau's attitude towards Japan before and after the Movement of Traveling about Japan. Before the movement, Phan Boi Chau considered that Japan was a new power which had the same origin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Vietnam. He expected that Japan would offer military aid to Vietnam. However,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movement, Phan Boi Chau believed that Japan was a nation which preferred power to moral and it betrayed the yellow race and Asia. But he held a positive comment on the quality of the Japanese and advocated that it should become the model for the Vietnamese.

潘佩珠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越南民族独立运动的倡导人之一。越南阮氏王朝在法国军事力量的威逼之下签订《巴德诺条约》，沦为法国殖民地，各地勤王运动也先后被扑灭。在此背景之下，潘佩珠远赴日本，发起了东游运动，鼓动越南青年赴日留学，冀望培养新生力量，促进民族国家的独立，但运动以失败告终。在东游运动过程中，包括救亡策略、国际关系认知等方面在内的潘佩珠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对日认识是潘佩珠上述转变的契机，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以《潘佩珠自判》为中心^[1]，考察东游运动前后潘佩珠对日认识的转变过程，并浅析他的对华认识。

东游运动的起因及其过程

潘佩珠 1866 年出生于越南东烈社沙南村，父亲是且耕且读的儒士。他 6 岁学习《论语》，7 岁父亲授以经传。19 岁，潘佩珠组织义军抗法，但法军以强大军力扫荡射杀，义军心灰胆寒，一触即溃。潘从此知急躁冒进之不可，转变了策略。“自是之后。凡十余年。余专从事于修养。一方面愈致力于时尚之文艺。思博一名。务厌俗誉。以预为他日驰骋之地步。一方面潜求古兵法战阵之策籍。如孙子十三篇。武侯心书。虎帐枢机。兵家秘诀等书。皆于深夜密室。手写而熟念之。以预为他日实行之模本。”^[2]亦即一方面用功于文艺，期望通过

[收稿日期] 2011-08-23

[作者简介] 刘先飞，中山大学中文系 2007 级博士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文字博得大名,增加自己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学习军事韬略,谋求武装独立。1900年起,潘佩珠开始多方奔走,广为结交,意图拥立畿外侯疆抵,复兴越南皇室。他意识到以越南自身的力量难以对抗法国,势必要借助他国力量。经过考虑,他决定赴日本寻求军事援助“余想现时列强情势。非同文同种之邦。谁肯助我者。中朝已让我越与法。况今国势衰弱。自救不暇。惟日本为黄种新进之国。战俄而胜。野心方张。往以利害动之。彼必乐为我助。纵秦兵不出。而购械借资。必易为力。”^[3]显然,潘首先是在当时的强国中挑选他的目标,强国之中再进一步寻找“同文同种”之国,这就将范围缩小在东亚国家,而中国清政府当时已经“自救不暇”,日本则刚战胜了俄国,是“新进之国”,因此将求援国定在了日本。他的具体求援目标则是日本出兵相助,或是提供武器援助。

1905年6月,潘佩珠等一行3人经香港抵达日本。抵日后潘首先拜谒了戊戌政变后流亡横滨的梁启超。梁启超为其引见了日本前文部大臣犬养毅,犬养又带潘见到了曾两次担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四人共聚一室。潘佩珠向犬养与大隈提出了求援事宜,犬养的答复首先是要潘将畿外侯带来日本,不让他落入敌手。然后表示日本不会出兵越南,因为“日欲援越南。则必与法开战。日法开战则全球之战机皆动”,局面将演变成日本代表亚洲向欧洲宣战,日本尚没有力量与整个欧洲开战,因此只能以民间力量援助越南。大隈提出要潘“鼓动国中人士。多数弃国外出”,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并且建议潘带领其党人定居日本,表示日本会“待以外宾之礼”^[4]。

日方的答复使潘佩珠寻求兵援的目标落了空。犬养和大隈的建议只是带畿外侯来日定居,并鼓动越南国人出国留学。潘是否感到失望,从自传中无法看出。这次聚会之后,梁启超又在家中约见潘佩珠,两人笔谈良久。梁启超以“兄弟”形容中越关系,“岂有兄坐视其弟之死,而不救之乎”,并提出两个建议,一是将越南惨状摹写出来公诸世界,取得世界舆论支持,二是以文书鼓励青年出洋留学。梁最后劝潘卧薪尝胆,因为越桂、滇越两条铁路是中国的“心腹之患”,中国一旦强大,第一个宣战对象必是法国。潘佩珠听后感觉豁然开朗,“深悟从前思想。乃所经营。皆孟浪荒唐”^[5],当即写成《越南亡国史》交梁启超,由梁启超代为

印刷。随后返回越南,发起了东游运动。

从潘的这段回忆来看,首先,在日本见到中日两国政治人物之后,他才认识了现代国际关系,意识到日本出兵援越是不可能的,而中国为两条铁路出手相助更为现实。其次,组织越南年青人出国留学这一建议,由日本人大隈先提出,梁启超则给出了更为详细的操作方案“以文书鼓励青年出洋留学”。潘面向越南青年写成的《劝国人游学书》也是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写就的。

此后两年,潘佩珠一面写成《海外血书》、《续海外血书》、《新越南》、《哀告南圻父老》等文,在越南广为传布,意图唤起越南民众意识,一面往来越南与日本之间,携畿外侯与越南青少年赴日。其间,1906年,潘佩珠在中国广东成立越南维新会,启蒙民众与组织政党同时并行。

潘佩珠带出的第一批学生4人进入了日本振武学校。第2批学生100余人抵达日本后,振武学校校长福岛安正表示,自己作为政府参谋部长官,“不能显然与他一国之革命党相提携。此外外交之惯例也”^[6],振武学校作为公立学校也不能公开收容越南学生,否则法国政府会来抗议。福岛提出要潘佩珠带来的学生加入东亚同文会,以民间交流形式入学。经过福岛介绍,东亚同文会辟出5间教室为越南留学生专用。一番经营之后,1907年10月起,越南留学生陆续入校,全体学生组成越南公宪会,至1908年7月,学生人数达到200人左右,秩序良好。

法国政府察觉到了越南国内青年的异动,开始追查。在转运国内捐款过程中,留学生邓秉诚等人在香港被法国警察抓捕,被追究同党。1908年,应法国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派警察到校,要求越南学生写信回国,由日本警察转交。9月,日本政府发布了越南学生解散令,并没收了3000册《海外血书》,在法国大使馆院子里烧毁。潘佩珠紧急向犬养、福岛求助,对方答复说这是官方指令,“吾等亦不可争”^[7]。不过这也许是暂行政策,越南留学生可以勤工俭学,日后再设法恢复。潘佩珠依言劝留学生勤工俭学时,除了5人之外都坚决要回国。潘佩珠只能筹钱发放解散费,其中犬养毅捐出了2000日元。越南学生悉数回国,东游运动就此结束。之后潘佩珠仍留在日本活动,至1909年2月,日本政府发布命令,要求潘佩珠24小时内离境。1909年10月,畿外侯疆抵被日本政府驱逐

出境。日本不仅没有提供潘佩珠所期望的兵援，连潘的活动基地都不提供，潘佩珠在日本境内的活动宣告失败。

潘佩珠对日认识的转变

潘佩珠对日本的认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赴日前、在日前期、在日后期。赴日之前，潘佩珠读过由中国传至越南的《中东战纪》、《普法战纪》、《瀛寰志略》等书，他对国际关系与时局、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来自这些书籍。他以“秦兵”借指日军，暗含以藩国向宗主国求援的思维，透露出朝贡体系的遗留影响。同时，他相信日本与越南同为黄种人国家，会维护黄种人的共同利益，以人种为利益划分标准，这种思想则是朝贡体系中所没有的。这个时期，潘佩珠的日本认识是：同文同种，黄种新进之国。对于亚洲新兴起的势力日本，潘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日本能站在同一文化传统、同一人种、同一亚洲这一立场上，借兵、借武器装备给越南。

抵日之后，他接触到前内阁成员犬养毅、大隈重信、议员柏原文太郎、参谋部总长福岛安正、东亚同文会会长锅岛等人，在日本生活前后约4年，与中国等亚洲其他国家的人士多有来往，他的对日认识比赴日前更为清晰。

一方面，犬养毅、大隈重信、福岛安正等日本政府人士都反复向他表示，日本政府不可能出兵，也不可能公开收留他带出来的越南学生，维新党人的活动必须控制在民间交流的范围之内。实际上，犬养等人与潘佩珠的交往，完全出于日本本国的战略考虑，如同其与康有为、梁启超的交往一样，真实的意图是在对方国内扶植本国势力代言人，并且是在不损害本国最大利益的前提下。潘佩珠对于这样的意图不可能全无认识，因此听到梁启超的建议后，才会将期待对象由日本转变为中国。畿外侯疆抵抵日后，由于未经法国允许不得收留越南皇族，日方要求他冒充留学生。潘认为这种处置“亦文明国之一巧手段也”^[8]，证实此时潘佩珠对现代外交已经有新的认识，文明国家日本既要给国际公理一个交代，又要灵活运用民间手段处理具体事务。此时他已经知道日本不可能出兵援越，但对日本的“巧手段”还是抱有期待与信任。

另一方面，日本国民素质一直在促使潘佩珠思考。潘佩珠的自传中有两个具体事例，揭示出在日

前期他对日本国民的印象。第一个事例发生在潘佩珠初抵日本的时候，他到横滨下车后，找不到自己的行李，又不解日语，呆立无计。日本警察前来与之笔谈，告诉他到了旅店行李就会跟来。潘才得知日本电车人与行李分装，行李由车役护送。“车中无拾遗者”，潘佩珠由此感叹“强国之政治。与其国民之程度。只此一事。视我国何异天渊哉。”^[9]之后，潘佩珠得梁启超推荐，上东京寻找振武学校的学生殷承献。潘至振武学校后才知殷某已经离校，住在东京的旅店，却不知具体旅店名称，完全不知何从寻找。此时拉着潘佩珠等人的日本车夫让他们在原地等待，自己独自在东京各旅店寻找，终于找到殷。潘原以为车夫会索要重金，但车夫只要车费25仙，说这是内务府的规定，这段距离只能收取这个费用。潘“为之心倒”，“我国民智识程度。视日本车夫。宁不惭死”^[10]。他对日本社会组织之有序，以及国民遵章守纪的良好素质印象深刻。

其后，在《海外血书》、《越南国史考》中，潘佩珠向越南人勾勒了一个美好的日本。首先，日本国君主爱民如慈母怜幼子，育孤儿，救病人，建医院学校，无一不先民后己。讲和、开战、征税、征兵等则无一不决于民议院。这样的描述实际上暗含了儒家的“仁君”形象。其次，日本国民上自公侯下至妇孺，思想丰富，崇尚公德，将爱国合群作为人生不可少的义务，这些对国民的描述则侧重其组织公共生活的素质。考虑到这些文章是面向越南民众的宣传，其中不排除为了树立榜样而夸张的成分，但结合上述两个自传中提及的亲身经历来看，在日前期，潘佩珠对日本国民评价甚高，认为其具备高度的国民素质。在他的叙述话语中，儒家的“仁爱”传统与现代的公民社会组织原则交错在一起。整体而言，在日前期，潘佩珠认识到日本从本国利益出发，不可能出兵越南，但还是寄望日本采取灵活方式为自己的活动留出空间，同时，他特别留意日本国民素质，对其印象深刻。

至日本政府发出越南学生解散令，再至自己和畿外侯被驱逐，潘佩珠对日本越来越失望。解散令发出之后，犬养等人面对潘佩珠的求援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实际行动，完全没有向日本政府作出争取。潘在自传中谈到日本友人浅羽佐喜太郎“极鄙日本之政客。即之大隈犬养亦羞称之。谓余曰。彼等对君。阴谋野心家之伎痒耳”^[11]。这段文字，

也间接表明了潘佩珠对大隈等人的评价,否则他不会原文引用。总而言之,“公宪会亡。余知日本之不可恃。专倾向于中华革命。及世界各民族之与我同病者。”日本之不可依靠已经是昭然事实。早在1905年9月,犬养毅介绍孙中山与潘佩珠结识,孙中山就告诫潘说,越南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赶走法国人,肯定要求助于邻邦,但“日本何能厚援君。日本政治家。大抵富于野心。而贫于侠义”,建议他多与“世界人”结交,“重人道。薄强权。世界不乏此等人。始能为君等援耳”。潘当时并未深信其言,直至现实摆在面前,潘佩珠才完全相信了孙中山的判断,日本不是“重人道,薄强权”的国家,而是一个重强权、轻人道的国家,不是王道国家而是霸道国家,“至是益验联络世界之思想”。以侠义期待日本已经不现实,潘佩珠转向与越南处境相同的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革命党人联合,互相提挈,“以谋共跻各民族于世界之舞台”^[12]。1908年,潘佩珠与中国章炳麟、张继等9人,朝鲜赵素昂,日本界利彦、宫崎滔天以及印度人和菲律宾人等一起组成东亚同盟会。此后,“又念唇齿密切之关系。莫如中华”,与云南学生会会长赵伸、广西学生会会长曾彦成立了桂滇越联合会,不仅争取同处民族危机的东亚国家,也争取战略利益相同的中国国内省份。不久东亚同盟会就被日本政府强行解散,潘佩珠感叹“吾人须知处于强权世界。几无一正义公理之会。而能堂皇标揭者也”^[13],认为强权国家日本解散了“正义公理之会”。

东亚同盟会被解散后,潘佩珠在日本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受限,最终被驱逐出境,他所拥护的畿外侯也被驱逐。接到疆抵被驱逐的消息后,潘佩珠致信当时日本的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在信中,潘佩珠将疆抵定位为亚洲黄种人的一皇族,而不只是一个越南皇族,赞颂其作为一个亚洲人,不愿为欧洲人的牛马;作为黄种人,不愿为白种人的奴隶,声称如果所有亚洲黄种人都能有疆抵的意志,则数十年后,将会实现“我黄种人繁殖地”。在将疆抵塑造为黄种人的英雄代表后,潘批评日本自认雄霸、文明,却容不下有功无罪的这样一个黄色人种皇族,指出长此以往,黄种人的权利将日益消亡,以后一个世纪以内,东洋黄种人将屏息于白种人鼻息之下,令人不禁为“全东洋黄种人”而悲痛。他批评日本政府不为公理与强权相争,反而曲于强权抹杀公理,不维护爱国义人

及与“日本同洲共种的亲人”,而却屈服于法国政府的压力;指出数十年以来,日本与俄国开战,又征服韩国,结果却与西方强权国家沆瀣一气。潘佩珠最后严厉批评小村作为“文明国人的代表”,作为“亚洲人”、“黄种人”,对亚洲黄种人卑贱轻侮,不问罪行肆意驱逐;对欧美人卑下奉承,不论是非一概奉承,“卑黄种尊白种”、“贵西人贱东人”^[14]。这封信明确表露了潘佩珠离日前后的对日认识。在黄种人一白种人、东方一西方的对立框架下,他批评日本背叛了这个框架中的黄种人和东方,背叛了它应当遵从的道义,而屈从了强权。离日前后,潘佩珠对日本政治家与政府已经完全失望,赴日前对日本的期待完全落空。

潘佩珠对日本这一国家的认识虽然前后不同,但他对日本国民的认识则始终如一。潘有一日本友人浅羽佐喜太郎。潘穷途之际,曾向浅羽佐求助,对方即刻拿出家中全部现金,汇来1700日元,并告诉潘“如尚需者。则速以书来。只此聊聊数句。一切不带客气辞”^[15]。潘佩珠回忆录的叙述对浅羽佐的豪侠之气颇为推赞。浅羽佐死后,潘佩珠至静冈为其立碑,当地村长听说后,召集小学生及家长在操场集会训话,云“人类所以长存者。以其有互相亲爱之感情耳”,浅羽佐以侠肝义胆助他国人,他国人专为立碑,义气真挚,我村如不相助,“亦日本国民之辱也”,因此决定承担运输、立碑的工序。潘佩珠认为此事“足见日本国民程度之一斑”^[16],对日本“国民程度”的赞叹在自传中反复出现。应当指出的是,潘对“国民素质”的内涵定义并不清晰,不像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有全面、详细的论述。从回忆录来看,潘佩珠对日本国民素质的认识在于其对本国有鲜明的民族国家意识,对他国慷慨相助,遵守规章制度,不贪钱不勒索。

与潘佩珠的对日认识形成对照的,是他的对华认识。出国之前,意识到清廷已经放弃越南,他并没有将中国当做求援对象。经香港时,他曾致信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岑未回信,潘认为中国专制朝廷无人,满清与越南当局是一丘之貉,对中国深为失望。在横滨见到梁启超后,梁对他多有鼓励、建议与实际扶持,他认识到与中国,尤其与云南广西的合作更为现实,并接受了梁启超以文章启蒙大众的建议。在东游运动失败后,他反思自己的失败,认为“东渡游学画虎不成。义塾合商作茧自

缚。宣传缓进等套语。已视为不入耳之空谈。昼作夜思。惟求得武装革命之实现”^[17]，从此放弃了宣传启蒙的道路，专心于暴力推翻法国殖民者。这种思想转变又与章炳麟等革命党人的影响有关，也是在这些人的影响下，潘佩珠放弃了保皇立场，转为争取民主共和，新组织的政党也取名“越南光复会”。

离开日本后，潘佩珠曾短暂停留泰国，但大部分救亡活动都在中国展开，与黄兴、陈其美、段祺瑞乃至蒋介石等人都有来往，其中陈其美曾赠与4000银元与30颗军用炸弹。法国政府曾向袁世凯政府要求引渡潘佩珠，但“袁政府皆以无证据却之”^[18]。1924年，范鸿泰暗杀法国公使后，法日向广东军政府要求驱逐越南人，“粤政府严词拒之”^[19]。孙中山表示没听说过有越南人，即使有，也都是好人。胡汉民则回答说事情发生在租界，是英法警兵不力之罪。中国对法国政府的拒绝，对越南光复会的维护，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12年，潘佩珠介绍印度革命党投奔广西桂军陆荣廷，被陆婉拒。相形之下，潘对于越南光复会所获得的支持深为感叹“若我党者。入北京士官学校。入广西陆军学校。入广东军官学校。教

之。养之。保全之。毫无所吝。华人对我。其感情不已厚乎”^[20]，中国对他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潘佩珠的这段感叹流露出了深厚的信任。

结论

东游运动前后，潘佩珠的思想从武力勤王，转为启蒙大众、保皇维新，再转为武力暴动、民主共和。这个变化过程，受到了日本和中国的影响，反之，他对日本和中国的认识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赴日前，他认为日本是同文同种的新兴亚洲强国，期望从日本获得军事援助。在日前期，他意识到日本不可能给予越南任何官方援助，转为依靠日本民间力量，寻求弹性活动空间。在日后期，东游运动的失败及东亚同盟会的被解散使他认识到日本政府的强权性质，他批评日本为跻身强权国家而不顾同文同种之道义，指出了日本东亚政策的欺骗性。而他对日本国民素质的认识则始终印象深刻，认为值得越南人学习。与日本相比，潘佩珠在回忆录中多次记录了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援助，以及中国顶住法国压力对越南革命党的保护，对中国抱有深厚信任。

【注 释】

[1] 本文所引用的《潘佩珠自判》出自1965年吴成人赠与内海三八郎的手抄本。内海三八郎将其翻译成日文并加注解。日本芙蓉书房于1999年出版，附有原文。

[2] 潘佩珠《潘佩珠自判》，载于《潘佩珠传》，（日本）芙蓉书房，1999年，第244页。

[3] 同 [2]，第250页。

[4] 同 [2]，第255页。

[5] 同 [2]，第256页。

[6] 同 [2]，第271页。

[7] 同 [2]，第275页。

[8] 同 [2]，第262页。

[9] 同 [2]，第254页。

[10] 同 [2]，第260页。

[11] 同 [2]，第283页。

[12] 同 [2]，第281页。

[13] 同 [2]，第282页。

[14] 白石昌也《东游运动时期的潘佩珠》，《东南亚的留学生与民族主义运动》，（日本）巖南堂書店，1981年，第281-282页。

[15] 同 [2]，第281页。

[16] 同 [2]，第283页。

[17] 同 [2]，第293页。

[18] 同 [2]，第298页。

[19] 同 [2]，第315页。

[20] 同 [2]，第292页。

【责任编辑：邓仕超】